

张浚、张栻的生平、学派和思想特点

杨国宜¹

(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

安徽 芜湖 241000)

【摘要】:张浚、张栻父子创建的蜀湘学派,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影响。他们在两宋之际,适应时势的需要,立志报国,共济时艰,不仅在抗金战场上建功立业,而且著书立说,出入理学的师承门户,积极倡导实学实用、经世致用,与理学颇有不同的事功思想。张浚、张栻的“门人”很多,包括后来生活在南宋中期的浙东事功学派,都受到他们的影响。

【关键词】:张浚 张栻 理学 实学 事功

【中图分类号】:B244. 99 【文献标识码】:A 【文章编号】:1006—0448(2018)04—0015—10

宋学中,张浚、张栻父子创建的蜀湘学派,虽然在《宋元学案》中已经汇集了大量可供研究的资料,可是学术界至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,以致这个学派是否存在?特点如何?影响如何?大都缺乏论述,以致模糊不清,知道的人不多。近年,我在研究浙东学派的过程中,根据其学派师承的线索,发现学术界公认为南宋中期事功学派大师薛季宣、陈傅良和叶适,与其乡贤吴松年、王十朋、郑伯熊的关系很密切,而他们又是张浚的“门人”。再查张浚、张栻的著作,发现了大量论述“事功”的词语,学术界还没有人使用这些资料加以论说,我据此提出他们具有明显的事功思想。

张浚、张栻父子生活在两宋之际,本是伊洛理学的传人,但却又与时俱进,进行改革,积极倡导实学实用,具有讲求事功的倾向和特点,是个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?从其时代背景看,主要是由于北宋末年政治腐败,国力衰落,社会动荡,统治危机十分严重。宋徽宗时,不仅阶级矛盾高涨,出现了宋江、方腊等农民起义;而且民族矛盾激化,在金兵压境之下,无力应对,导致了“靖康之耻”。宋高宗在爱国军民的支持下,被迫南迁,偏安江左。如何挽救国家危亡,稳定局势,恢复旧业?成了那个时期最为重要、最为迫切的问题。据《宋史》记载,早在宋徽宗时就曾下诏:“绍复先烈,当在今日,事功显著,优与推恩。”^{[1] (P2374)}康王也曾贻书李纲:“方今生民之命,急于倒垂,谅非不世之才,何以协济事功,阁下学穷天人,忠贯金石,当投袂而起,以副苍生之望。”^{[1] (P11250)}宋高宗时,廖刚奏:“经费不支,盗贼不息,事功不立,命令不孚,及兵骄官冗之弊。”^{[1] (P11581)}孝宗即位,辛次膺奏:“陛下用贤,必考核事功。”^{[1] (P11803)}根据时势的需要,朝廷急需有恢复之志、敢于担当、有事业心、有建功立业思想的人才。这样的人才,不能仅只是“知书达理”,还需要“经世致用”。元祐时期盛极一时的理学,虽然有一套“修齐治平”的理论,但在如此严峻的时局面前,程颐和他的门人尹惇都自感无力,拿不出实际可行、挽救危亡的办法。历史的重任,便落在了李纲、张浚这些具有事功思想之人的身上。

一 张浚、张栻的生平和学派

¹收稿日期:2018—01—19

作者简介:杨国宜(1930—),男,四川南部人,教授,从事中国历史研究。

1. 生平事迹，志在报国

张浚，《宋史》卷 361 有传。字德远，号紫岩，汉州绵竹(今属四川)人。父张咸，元丰进士，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卒。张浚 4 岁而孤，母计氏含辛茹苦，抚养张浚兄弟成人。张浚从小立志向学，报效国家。政和八年(1118 年)中进士第。

靖康初(1126 年)，任太常簿。金兵陷京师，金人议立张邦昌时，张浚与开封士曹赵鼎、司门员外郎胡寅，不甘受辱，不书议状，一齐逃至太学中。闻高宗即位，驰赴南京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，除枢密院编修官，除御营使司参赞军事。建炎三年(1129 年)春，金人南侵，张浚抗御于吴门。苗傅、刘正彦作乱，张浚会同韩世忠、刘光世等平乱。高宗复位，被任知枢密院事。建炎四年，张浚提出经营川陕的建议，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。张浚在关陕 3 年，训练新兵，以刘子羽为上宾，任赵开为都转运使，擢吴玠为大将守凤翔。西北遗民，归附日众。

虽然富平大战失利，但全蜀安全，且以形势牵制东南，江、淮亦赖以安。绍兴五年(1135 年)，张浚出任右宰相，兼知枢密院事，都督诸路军马，却敌有功。绍兴七年(1137 年)，秦桧主和，张浚被贬居永州(今湖南零陵)，后又谪居连州(今广东连县)，后再移居永州、潭州(今湖南长沙)，长达 20 多年。直到绍兴三十一年(1161 年)，金军南犯迫在眉睫，高宗才起用张浚判建康府(今江苏南京)。到任时，金主完颜亮在采石被部下杀死。高宗认为宋金之战终归于和，并不重用张浚。次年(1162 年)六月，高宗退位，孝宗即位后，召张浚入见。张浚从容回答说：“人主之学，以心为本，一心合天，何事不济。所谓天者，天下之公理而已，必就业自持，使清明在躬，则赏罚举指，无有不当，人心自归，敌仇自服。”^[1] (P11308) 孝宗任命他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。隆兴元年(1163 年)复为枢密使，都督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，渡淮北伐，收复宿州等地，后因部下将领不和，兵败符离，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。

汤思退被任为右相兼枢密使，不久再升左相兼枢密使，张浚虽也升为右相兼枢密使、兼江淮东西路，但主和派占据了上风。张浚在隆兴二年(1164 年)三月视师淮上，积极部署抗金措施，但到四月却被召回朝，江淮都督府被罢。在太上皇高宗的干预下，左相汤思退更加紧进行降金乞和活动，张浚感到抗金无望，即求致仕，遂被罢相。在回湖南途中，还说：“上如欲复用浚，当即日就道，不敢以老病辞”^[1] (P11310)，行至江西余干得疾去世。可见其爱君忧国之心，始终如一，时刻不忘建功立业的初心！

张栻(1133—1180 年)，与他的父亲张浚一样，其平生志愿也是志在报国。《宋史》卷 429 有传。他绍兴三年(1133 年)出生于父亲驻军阆中(今属四川)的军营。颖悟夙成，深得张浚的喜爱。绍兴八年(1138 年)，张浚被谪居永州(今湖南零陵)居住，张栻年仅 6 岁，即随父前往。此后其父再迁连州、永州、潭州等地时，张栻皆随同居住，接受父亲的教育和儒家传统文化的学习与熏陶，长达 20 余年，学问见识，逐渐增长成熟。

孝宗即位后，意欲北伐。张栻“慨然以奋伐仇敌，克复神州为己任”。朝廷启用张浚，开府治戎，其参佐皆极一时之选。张栻这时已年满 30 岁，学业有成，见识颇广，亦得以荫补官，辟为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。“时时内赞密谋，外参庶务，其所综画，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也。”^[1] (P12770) 张栻并因除直秘阁，有时得以军事入奏，向皇帝进言：“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，下闵中原之涂炭；愿益加省察而稽古，亲贤以自辅，无使其或少息，则今日之功可以必成，而因循之弊可革矣。”^[1] (P12770) 孝宗听其言很感兴趣，遂定“君臣之契”。

隆兴二年(1164 年)，张浚去世，张栻护丧回湖南后，长期在长沙城南书院、岳麓书院等地授徒讲学，时间长达 10 余年，与朱熹、吕祖谦等学人多次聚会，湖湘之学大兴。其间，经刘珙等人推荐，召为吏部员外郎兼权起居郎，后又兼侍讲除左司员外郎。在不到 1 年的时间里，被孝宗召对六七次。所言大都为修身、务学、畏天、恤民、抑权幸、屏谗谀之类，并反复推明抗金复仇之义。遭到孝宗周围近臣的不满，将其排斥离朝，仍回湖南教书。

直到淳熙二年(1175 年)，孝宗念之，诏除旧职，知静江府，经略安抚广南西路，政绩颇佳。3 年后，改知江陵府，安抚本路。张栻每到一地，都能关心民瘼，访求利病，改革弊政，兴利除害，减轻负担，兴办学校，深得当地民众的爱戴。淳熙七年

(1180年)二月，张栻病卒于江陵，年仅48岁。孝宗闻之，深为嗟悼，四方贤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吊，而江陵、静江之民尤哭之哀。

从以上简单的论述中，不难看出张浚、张栻父子的事业，皆在奋发有为，报效国家。真可以说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而其所以能够做到这样，则是由于他们学有师承，思想成熟，具有坚定的信念，组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学派，去共赴时艰的结果。

2. 师承学派，共济时艰

两宋之际，经历靖康之变，宋室南渡，战乱频繁，社会动荡，是一个时势艰难的时代。《宋史》称：“（张浚）与赵鼎共政，多所引擢，从臣朝列，皆一时之望，人号小元祐，所荐虞允文、汪应辰、王十朋、刘珙等为名臣；拔吴玠、吴玠于行间，谓韩世忠忠勇，可倚以大事；一见刘錡奇之，付以事任，卒皆为名将，有成功，一时称浚为知人。”^{[1] (P11311)}在他们共同努力下，勇于担当，共济时艰，才挽狂澜于既倒，救生民于倒悬，真是十分可贵和值得充分肯定。他们为何能够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，取得恢复稳定的重大成就？我认为重要的原因，是由于他们自幼攻读儒家经典，能够传承师门遗教，努力维护优秀的传统文化，不遭毁灭的理念。那么，他们师承的是谁呢？学术界对此研究不多，特钩沉考述如下：

《宋元学案》卷44《赵张诸儒学案》把赵鼎、张浚列为同一学派。编者全祖望在“按语”中说：“中兴二相，丰国赵公尝从邵子文（伯温）游，魏国张公尝从谯天授（定）游。”^{[2] (P800)}因为邵、谯二人都是程门弟子，于是赵、张二公也就成了理学传人。张浚既是谯定的门人，也就是程颐、苏轼的再传弟子了。但张浚的“师承”，又不单是伊洛理学，其“家学”“先绪”，也很是渊源流长的。其祖父张紘，曾举“茂才异等”，至和元年（1054）知雷州，是一个既懂军事，又懂城防建设、农田水利，更重视教育的实用型学者官员。其父张咸（1048—1099年）元丰三年进士，官至成都节度判官，其学更是“六艺百家，历代文史，无不该贯”^{[3] (卷44)}，知识面也是很广博。张浚在太学读书时，还从蓬州老儒严庚学《易》，得其“乾坤二说”。可见其师承颇广^{[3] (卷44)}。至于张栻的师承，首先应是“家学”，他自幼便和父亲生活在一起，“栻颖悟夙成，父浚爱之，自幼学所教，莫非仁义忠孝之实”^{[1] (P12770)}。绍兴八年（1138）之后，张浚贬迁永州、连州、永州等地居住，张栻皆随父前往。在连州时，张浚亲自教授张栻《周易》之外，又令其向曾任知州的王大宝（1094—1170年）学习二程理学。居永州时，又前往衡山拜胡宏为师，胡宏对他的学行十分欣赏，当即向他传授了孔子仁义之旨，和二程理学的要义。

人们常说，同气相求，同类相助。师承有序的学者们，自然会很容易结合在一起，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，组成一个“学派”，以共济时艰，创造事业。据《宋元学案》及其《补遗》的记载，张浚的“学侣”有赵鼎、刘子羽、汪应辰等人。张浚的“同调”有陈良翰、芮煜、陈鹏飞、虞允文、刘珙、杜莘老、张孝祥、张阐、金安节、张宋卿、詹至、徐淮等人。张浚的“门人”有王十朋、杨万里、胡铨、李良臣、吴松年、刘颖、张子行、方畴等人。张浚的“家学”有张栻、张构等人。可见其人数甚多，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，应该是基本一致，差别不大。因而能够在实际社会生活中，互相砥砺，互相支持，度过两宋之际那个社会动荡不安的艰难时期，使之逐渐稳定下来，获得继续发展的机会。

据有关史料记载，张浚与赵鼎“同在相位，以招徕贤才为急务，从列要津多一时之望，人号为小元祐”。宋高宗有一次与张浚等议论人才时说：“蜀中多士，几与三吴不殊，近日上殿如李良臣、蒲贇，极不易得。因论士人各随所习，如蜀中之士多学苏轼父子，江西之士多学黄庭坚。”浚等曰：“大抵耳目所接，师友渊源，必有所自。”^{[4] (卷111)}陈良翰上疏说：“汤思退奸邪误国，宜早罢黜。张浚精忠老谋，不宜以小人言摇之。”^{[2] (P804)}王大宝，曾在朝中与赵鼎、张浚共事。后被秦桧挤压到地方任职。赵鼎谪潮州，大宝不避嫌疑，“从之游，日讲论语”。

后知连州，张浚先谪是州，即命其子张栻“从之学”。当时，州帑紧张，张浚俸不时得，大宝以经制钱给之。张浚惊曰：“如累公何？”王大宝说：“得丧命也！”人们叹息不已。后孝宗任张浚都督军事，大宝力赞其议，已而师溃而归，群议汹汹，大宝持之益坚，请“果断持重，以止横议”^{[9] (卷4)}又如刘子羽，在张浚知枢密院事，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时，就共事多年，志同道合，相知甚深。其子刘珙，在陪同宋高宗巡幸建康时，兼直学士院草拟诏书，高宗将还杭州，建康的军务未有所付，众望所归的人选应该是张浚，但高宗却拟用杨存中。刘珙认为杨存中难当此任，不肯草诏，高宗认为刘珙是想把此任留给张浚。宰相便对刘

珙说:你认为张公好,但皇上不喜欢,你这样作不好,还是听皇上的吧!刘珙仍然坚称:杨存中不可用。“某为国家计,岂暇为张公谋”^[1] (P11850),执奏如初。还有,芮煜绍兴进士,后任修撰,“愤秦氏之乱政”。常州通判沈长卿者,经常与人们议论“和议之非”^[2] (卷44)。他们与张浚一样,对抗战报国、共度时艰,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
《宋元学案》卷50《南轩学案》认为,张栻的学术地位很高,人称南轩先生,自成一派。其“讲友”有朱熹、吕祖谦、赵汝愚、潘昉、张杰等人。其“学侣”有陈傅良、胡大本、张寓等人。其“同调”有赵不息、刘靖之、刘清之、丘密、吕陟等人。他们生活的时代主要在南宋中期,较张浚的时代稍后,社会趋于安定,痛定思痛,总结历史经验,思想更趋成熟。他们抗金报国、矢志不移,但更多强调整顿朝纲、轻徭薄赋、积蓄力量、发展教育、训练甲兵等方面。他们在各自岗位和领域,都作出了不少成绩。例如,张栻曾说:“今日但当下哀痛之诏,明复仇之义,显绝金人,不与通使,然后修德立政,用贤养民,选将帅、练甲兵,通内修外攘、进战退守,以为一事,且必治其实,而不为虚文,则必胜之形,隐然可见,虽有浅陋畏怯之人,亦且奋跃而争先矣。”^[1] (P12770)针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状况而言,应该是符合实际、切实可行的。张浚、张栻父子确实是学有师承,传承有序,师友众多,政治上互相支持,学术上互相砥砺,事业上互相促进,卓有成效,因而得到人们的称道和肯定。

二 张浚、张栻思想的特点

1. 一本天理,传承理学

张浚、张浚父子既然都接受过伊洛之学的教导,当然会对理学思想进行研究,而且表现到他们的言行中去。

据《宋名臣言行录·别集》下卷3的记载:张浚“公之学一本天理”。他说:“人主以务学为先,人主之学本于一心,一心合天,何事不济。所谓天者,天下之公理而已,必就业自持,使清明在躬,则赏罚举措无有不当。”“人主当务讲学,以为修身致治之本。”他自己治学,更是“以虚静诚一,求之于天为本”。在与交谈时,也未尝不依于此。并对儿子和门人说:“学以礼为本,礼以敬为先。”“学者当清明其心,默存圣贤气象,久久自有见处。”张浚在贬居连州时,曾作《四德铭》示人说:“忠则顺天,孝则生福,勤则业进,俭则心逸。”连人相与镌之于石,家传人诵。其对理学的修养和传承,可见一斑。因此,他虽然“去国至是几二十年,退然若无能者,而天下士大夫无贤不肖皆倾心,健将悍卒见之者必咨嗟叹息”。一旦回到朝廷任职,便上疏“庙胜之道,在人君正心以正朝廷,正朝廷以正百官,正百官以正万民”。并尝作诗曰:“群凶用事人心去,大义重新天意回,解使中原无左衽,斯文千古未尘埃。”朱熹为此诗作《跋》说:“举大义以清中原,此公平生心事也。观于此诗,可见其寝食之不忘,无一念不在君亲。”^[9] (卷3)可见,张浚传承理学的内涵和目的是非常明确的。

张栻秉承理学前辈的教导,和长期进行书院教学的探讨,其理学更具有自己的体系和特征。他继承二程的理本体思想,提出天、性、心三者,名异实同,皆同体于理。“理之自然谓之天,命于人为性,主于性为心,天也、性也、心也,所取则异,而体则同。尽其心者,格物致知,积习之久,私意脱落,万理贯通。”^[5] (卷7)他说:“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,其所以然者,天之理也。”^[5] (卷6)天下万物皆生于理,理是万物赖以生存的根据。他以太极为理,太极变化便产生阴阳二气,二气交感便有万物化生。“太极动而二气形,二气形而万物化,生人与物俱本乎此者也。”^[6] (卷11)在这个太极本体论的基础上,他进一步把“理”和“心”联系起来,“此心之发,即天理之所存也”。只要“勿怠此心,而亲贤稽古以广充之,则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,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”^[7] (卷13)。这就形成他的穷理格物,可以致知的认识论。

如何才能穷理呢?他提出穷理在于居敬,居敬在于存心。“其惟穷理而居敬乎!理明则有以精其知,敬立则有以宅其知,从事于斯,涵泳不舍,则其胸中将益开裕和乐,而所得日新矣。”^[6] (卷11)“故必贵于存心养性焉,存者颠沛造次必于是也,养者全之而弗害也,存之养之,是乃所以事天者也。”^[5] (卷7)他在《敬斋铭》中还说:“天生斯人,良心则存,圣愚曷异,敬肆是分;事有万变,统乎心君,一颢其纲,泯焉丝棼。自昔先民,修己以敬,克持其心,顺保常性。敬匪有加,惟主乎是,履薄临深,不昧厥理。事至理形,其应若响,而实卓然,不与俱往。动静不违,体用无贰,惟敬之功,协乎天德。有过斯改,见善则迁,知至而至,知终而终,嗟尔君子,勉哉敬止,成己成物。”^[6] (卷36)由此可见,他认为敬是存心的关键。这种居敬存心进行修养的功夫,坚持不

懈，既可以得到知识更新，又可以得到心理平衡，一切合乎天理，还有什么弊不可革、功不可成呢！因此，“明理居敬”应该是张栻理学思想的核心。

不过，据朱熹说“公之教人，必使之先有以察乎义利之间，而后明理居敬以造其极”，必须先摆正义利之间的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则是因为“学莫先于义利之辨，而义也者本心之所当为，而不能自己，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。一有所为而为之，则皆人欲之私，而非天理之所存矣”^[8]（卷89）。也就是说，学习的方法、道路和目的固然很重要，但首先还要有个正确的“态度”，学什么？为什么学？都要合乎“本心所当为”的“义”，也就是“理”。不合乎义理的“态度”，就不可能居敬格物，获得明理的真知，培养出真正的人才，去达到“治国平天下”的目标了。张栻在父亲张浚去世后，长期在长沙的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讲学，教授生徒，著书立说，对传承理学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
2. 通经明理，探寻本意

张浚、张栻虽然服膺理学，为之传播，尽心尽力，但又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，与时俱进，使自己的思想突破二程的某些局限，具有更多宋学的特点。中国学术的传统经典，是历史文化的积累，博大精深，是最为宝贵的遗产，但传世既久，文字变迁，意义难明，必须深入阅读，细致考证，才能通晓其义。这决非汉学家死守的“章句之学”所能解决问题的。与张浚“同调”的陈鹏飞，是绍兴十二年的进士，他自为布衣，便以经术文词名于当世，教学诸生达数百人之多，“其于经，不为章句，新说至君父人伦世变风俗之际，必反复详至，而趋于深厚”^[2]（卷44）。张浚本人更是对儒家经典进行过深入研究，史称其“学邃于易，有《易解》10卷，书诗礼春秋中庸亦各有解”。他解经的方法就是寻求本意，不为章句。例如，对《易经》“先王以明罚敕法”这一句的解释，便说是：“使天下格心趋化，先王立法本意，罚明则善劝恶惧，法于是行，刑可措矣。”^[11]（卷3）

不仅如此，张浚“通经”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“明理”，甚至于联系实际，作为“治国”的理论。他曾对宋高宗说：“臣尝考泰之初九，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为志在外，盖言其志在天下国家，非为身故也。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为志在君，则君子连类而退，盖将以行善道，而未始忘忧国爱君之心焉。观二爻之义，而考其心，则朋党之论，自不攻而破矣。臣又观否泰之理，起夫人君一心之微，而利害及于天下百姓，方其一念之正，其画为阳泰，自是而起矣。一念之不正其画为阴否，自是而起矣。然而泰之上六阴已，尽复变为阳，则君子在外而否之所由生焉，否之上九阳已，尽复变为阴，则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生焉。当今时适艰难，民坠涂炭，陛下若能日新其德，正厥心于上，臣知其将可以为泰矣。异时天道悔祸幸而康宁，则愿常思其否焉。”^[9]（卷3）他从《易经》中引用许多卦辞，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天下国家、君子小人、阴阳吉凶、顺逆泰否的关系联系起来。今天看来虽然不尽符合科学，但在当时说来，其忧国爱君之心、劝人为善之意和亲君子、远小人、改过自新等核心思想，还是很有价值的。

张栻与他的父亲张浚一样，也是饱读儒家经典，对《易经》《诗经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都著有“解说”。其解说也是不事章句，直抒本意。例如他在《论语解》中对“学而时习之”，就直接称说：“学贵于时习。”^[10]（卷1）只要经常不断温习书中的义理，清理其端绪，理解其含义，融洽于其中，喜悦之情便会油然而生，当然是很快乐的事了。又如他在《孟子说》中对梁惠王问“何以利吾国”时便说：那是因为当时“王者之迹熄，而霸说盛行一时，谋国者不复知义理之为贵，专图所以为利者”。因此，孟子便直接回答说：“王何必曰利，亦有仁义而已。”^[5]（卷1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他还说：“观书当虚心平气，以徐观义理之所在；如其可取，虽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废；如有可疑，虽或传以为圣贤之言，亦须更加审择。”^[5]（卷1）他在这里提醒人们注意，读书不能盲从，死读书是不行的，要看它是否合乎义理。不能唯书是听，唯上是从。何者为是？何者为非，应该以是否合乎“义理”为标准。这个标准很重要，“斯言诚是，岂独观书当然”^[6]（卷20）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。

3. 实学实体，体用结合

张公父子不仅读书认真，博览群书，获得了丰富的书本知识，并且从其中获得了“学须有用”“不为虚文”的认知。当时，学风不正，影响了政府急需人才的培养，连宋高宗也颇为感叹地说：“呜呼！士习为空言，而不为有用之学，久矣！”^[1]（P2713）张浚

在绍兴末被召回朝廷，开府治军，深感实用人才的匮乏。他发现吴松年“少年工于文”，是一个可以培养的好苗子，但沾染了一些华而不实的时尚文风，便对他说：“士当为有用之学，不必苦心词章。”^{[2] (卷32)}因而令与其子张栻交往，终于成为有用之才。张浚非常重视实学实体，体用结合，在“实”字上狠下功夫。史称：“张公到官，遍行边垒，览观山川形势时，犹有旧日戍守将，公悉召与握手饮酒，问祖宗以来守边旧法，及军阵方略之宜，尽得其实，故公起自疏远，一旦当枢筦之任，悉通知边事本末，盖自此也。”还说他“公专任国政，首言亲民之官，治道所急，而比岁内重外轻，遂条具郡守监司省郎馆阁之人迭补之法。四方灾异必以闻，祥瑞皆抑不奏”^{[9] (卷3)}。些都反映了他的实学和务实的作风。

张栻也认为，不能为读书而读书，应该务求实用。他教导“门人”曹集说“士君子之学，不过一实字”。于是，曹集在知南康军时，便均减星子一县预卖，辍郡廩以教育白鹿书院生徒，都是朱熹欲为而未及尽行者，办了许多实事。因此，杨万里的推荐书说：“南康地偏民贫，每岁流徙不绝，今皆安集，无有愁叹。望赐旌擢以为良吏爱民之劝。”^{[2] (卷71)}可见其实学实用思想，是很有影响和成效的。张栻还说：“士子实作工夫，耐久者难得。”^{[6] (卷25)}应该持之以恒，不能半途而废。张栻还把他的实学思想上升到理论层次，从知与行的关系方面考虑，提出了格物致知、知行互发的主张。他说：“盖致知以达其行，而行精其知。”“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，行之力则知愈进，知之深则行愈达。行有始终，必自始以及终。”^{[9] (序)}这种互发并进的知行观，认为知与行属于同一个认识过程，二者相即不离，行必须以知为指导，而知又因行而深化，知可促进行，行亦可促进知。张栻的这种知行观，显然要比朱熹的“知先后行”论和王守仁的“知行合一”论高明得多。

4. 读史通今，学究天人

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史学历来具有重要的地位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是最早的经典作品。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，“寓褒贬，别善恶，使乱臣贼子惧”，“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”，是史学功用最核心的名言。张浚父子在研读史书时获受教益，深感以史为鉴的重要。他们继承读史通今的优良传统，作为修身、待人和从政的指南。

张浚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典型人物非常熟悉，经常引经据典来说明问题和处理朝政。据《宋名臣言行录》别集下卷3的记载：他曾把周公的《无逸》篇缴呈宋高宗说：商朝的中宗、高宗和周朝的文王，他们“非徒自享安荣，而有国长久”。可是祖甲之后的一些王，“生则逸，是以罔或克寿”。只图享乐安逸，岁数不大便身死国亡的历史，值得注意啊！榜样力量是巨大的，张浚对前贤往哲的嘉言懿行十分喜爱，经常用以指引自己的言行。上书还称他“于本朝大臣最重李文靖公（沆），谓近三代气象。又以寇忠愍公（准）、富文忠公（弼）、范文正公（仲淹）之事为可法，当作三贤堂于敝庐之侧，庶朝夕想象，如见其人也。”他还曾把王朴的《平边策》抄呈宋高宗，希望他坚定抗战的决心：“陛下躬不世之资，当行王者之事，以大有为正心，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国势既隆，强虏自服，天下自归。”他发现当时朝廷中的正人君子，经常受到邪恶小人的无端诽谤，混淆视听，是非不明。便给宋高宗上疏说：“昔唐李德裕言：正人如松柏，特立不倚，邪人如藤萝，非附他物不能自起。臣尝推类而言之，小人在位，则同于己者誉之以为君子。异于己者排之以为小人。不顾公议，不恤治乱，不畏天地鬼神，彼其专于自营进身之计，故好恶不公，以至于亡身亡国，乱天下而莫之悔”，后果很不好。希望“陛下亲学问，节嗜欲，清明其躬，以照临百官，则君子小人之情状，又何隐焉。”是非好坏，是不难分清的。范仲淹的《灵鸟赋》说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。这种直言切谏、宁死不屈的精神，对后世影响颇大。张浚在绍兴初，主持军政，忠心耿耿，抗金报国，建树颇多，但被秦桧等人无端攻击，贬黜外地闲居，身处逆境。但他亲眼看到秦桧“欺君误国”的种种行径，导致的后果十分严重，便想给宋高宗上疏，“力论时事，以悟上意”。但又念及母亲计氏年高，言之被祸，恐不能堪。母亲发现他日益消瘦，问其何故？他只好如实禀告。母亲立即告诉他，你父亲参加科举考试的《制策》曾说“臣宁言而死于斧钺，不忍不言而负陛下”。至于再三，张浚之意遂决，乃上言：“当今时势，譬若养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，不决不止，决迟则祸大，而难测，决速则祸轻而易治。惟陛下断之于心，谨察情伪，预备仓卒（应变），庶几社稷有全安之理，不然异时以国与敌者，反归罪正议，此臣所以食不下咽，而一夕不能安也。”秦桧见之大怒，把张浚从永州贬到更加边远的连州。张浚还从范仲淹那里学习到“不欺”思想，范公曾说：“天威不远人，莫起欺天意。”^{[1] (P38)}在知邓州时，当地青年贾黯状元及第，回乡拜谢范公，求问为官做人之道。范公说：“君不忧不显，惟不欺二字，可终身行之。”^{[1] (P903)}不欺，就是上不欺君，下不欺民，堂堂正正做人，不欺自己的良心。张浚为官做人，也处处以此反思自己的作为。有时虽因其秉公办事，正色敢言，得罪了不少人，甚至遭到罢官，只要是“不欺”，问心无愧，就不必内疚，无需后悔自己

做错了什么事。张浚曾为“门人”王十朋作《不欺室铭》曰：“泛观万物，心则维一。如何须臾。有欺暗室。君子敬义。不忘栗栗。”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史称：“若孜孜为国无如浚者，清修笃慎有志天下，古人不能过也。”^{[9] (卷3)}

张栻，自幼接受父亲的教育，研经读史，耳濡目染，所学莫非仁义忠孝之实。他很喜欢读历史书，在27岁时，便辑录孔子大弟子颜渊的言行作《希颜录》上下篇，希望以颜渊为楷模，致知力行，以求孔子之道。后来又著《洙泗言仁》《诸葛忠武侯传》等书，皆有以史为镜的意义和作用。他在《江谏议(公望)奏稿序》中，不无感叹地说：“嗟乎！不有君子其能国乎？”接着，便根据北宋的历史，指出：“自祖宗有天下，留意多士，仁宗皇帝涵濡长育四十二年，而收其用，为元祐之政。”长期注意人才的培养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后来，元祐诸君子虽厄穷百罹，但他们“直道隐然，流风所被，论议着见于元符之末”。师承有序，文脉不绝，不久的“建中靖国之初，盖又彬彬如也。元气不倾，虽国家多故，而中兴之日，旋踵即见”。可见，“人才之为国，重轻如此”。确实是非常重要的。因此，“为国计者，其可忘封殖爱护，伸忠直之气，遏导谏之萌，以寿天下之脉；而人臣幸登王朝，其又可迟回利害之涂，自同寒蝉，卒蹈委靡陵夷，以负吾国家也”。君子是国家的精英，是真正的人才。他多次“劝上亲君子，远小人，信任防一己之偏好，恶公天下之理”。就是这个缘故。有人说“东汉之亡，党锢促之也”，把责任推到李膺、陈蕃等“党人”身上，他认为不对，“曾不知东汉若无数君子，其亡也尤速”^{[7] (卷13)}。他们都是君子，他们的“清议”是在反对宦官专权，反对腐败啊！如果不反对腐败，东汉亡得更快啊！再如，有人认为王安石变法为北宋之祸，他也不同意。他说：“本朝熙丰之初，役法当革也，科举当变也，冗官当去也”，积弊既深，已经导致了积贫积弱的局面。因此，“神宗皇帝慨然欲更张之”，虽然有一些老臣以为不可，神宗很不高兴，但“王介甫以为可以必更”，新法得以施行。新法既然是适应时势的需要，不得不进行的改革措施，又得到皇上的支持，初衷本意并无不善，只是由于“小人乘间用事，而天下之祸从此起矣！”^{[7] (卷13)}王安石是君子，不是小人；只是他急于求成，用人不善，让小人钻了空子，新法变质，好事实变成了坏事。祸在小人用事，哪里是变法惹出来的呢！因此，张栻不仅劝皇上亲贤臣远小人，而且自己“其远小人尤严。为都司日，肩輿出，遇曾觌，觌举手欲揖，栻急掩其窗棂。觌惭，手不得下。”^{[13] (卷125)}可见他读史通今，以史为镜，是很讲究学用结合的。

5. 倡导事功，倾向明显

张浚、张栻父子的理学思想，从以上的诸多特点看来，确实与传统的理学具有很大的不同，特别是他们的事功思想，更应值得注意。张浚的《紫岩易传》中，“事功”一词出现达10次之多。

张浚是学者型的朝廷大臣，著作颇多，《宋元学案》卷44称，其所著有《易解》及《杂说》10卷，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春秋》《中庸》，亦各有解，《文集》10卷，《奏议》20卷。但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，只有《张魏公集》(不分卷)，民国刻本，仅13叶。其《紫岩易传》(10卷)，为其曾孙张猷之抄录保存下来的。有“跋”云：“忠献公潜心于易，尝为之传，前后两著稿，亲题第二稿云，此本改正处极多，绍兴戊寅(1158)四月六日某书，始为定本。”^{[11] (跋)}

现将《紫岩易传》中涉及“事功”的段落抄录如下，略加疏解。

首先，张公问道：“方天下屯，孰无趋赴事功之志？”当天下遭遇时运艰难的时候，谁没有趋赴事功，救亡图存的志气呢？是的，当然有的。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是不需要组织动员，便会人所共趋的潮流。他说：“君子居屯(时运艰难)，生养天下心，未尝一日忘之”^{[11] (卷1)}，君子们时时刻刻都在想如何拯救天下。

当然，也会有一些小人“恶夫，遇合不贞(正)，动不以礼，丧已违天”，伤天害理，丧失人性，不肯救亡图存，却去谋一己之私，干坏事。但他们“终不能建立事功，以生利万物”，必然会“获罪于天下，后世耻之”^{[11] (卷1)}。

如何才能建立事功呢？那就需要团结一心，“众贤协归，则上可安宗庙，次可安百姓，下可安吾身”；如果“疑心一生，合者将离，尚可以致天下之豫(安乐)吗”？只有“尽其在我之诚，使无愧于天地，无欺于幽明，若雷动而奋，仁德以行，天下之贤其将合志同心，以赴事功之会”，就可以取得成功，“而我之德业，永永无穷矣！岂不美夫！”^{[11] (卷2)}

当然，还要注意“随道在系夫正否”，跟随的领导人如何？道路是否正确？如果“随匪其贞”，那就要出大问题，“在我则德损，在事功则必不能建立，在天下则必不能惠利”，头人不好，路线不对，哪能建功立业呢！“可不慎择欤”！如果领导人“德积于中，出而交物，物莫不服从其中正，而事功以建，是以吉”^{[11]（卷3）}。

如果“大臣履非其位，失静顺之常，难乎得君得民，而于事功有获矣！”^{[11]（卷34）}如果任职大臣的才学不够，缺乏办事能力，那就很难得到君、民的支持和拥护，更难在事功方面有所收获了。

特别是“位在互乾上”的领袖，如果“亢动失正”，傲然盲动，不按正确的规律行事，也会“事功不立”的。因为“在上位于恒而无志，以动失常之正，必不能去民之害，而与其利，何以有获邪！”^{[11]（卷4）}他们既然居于“上位”，就应该具有坚定的意志，不能动辄“失常”，摇摆不定，那能取得事业的成功呢！他还说：建立事功，必须“节之在礼，守之在中”。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必须合理适中。“不然悦动不已，而失顺静之道，何以能久”。单靠一时的热情冲动，是不能持久的。“惟臣之于君亦若是，夫英才遇时，有悦动之志，而不知谨礼揆中，若后世汉贾生蔑视绛灌，纷改制度，事功亦何从而立哉！”^{[11]（卷5）}他认为，如果不遵守理法，不合时宜的乱改一气，事功也是无法建立起来的。为臣者，只有“惟正以待命，俟君之应，而后展尽其才力，则君心可复，事功可成。”^{[11]（卷6）}建立事功，必须依据时代发展的需要，进行，“动以趋时，动不妄动”，“应初而动，上下进退，惟恐失时”。还要以道德思想作指导，“勉德业之为，趋事功之会”^{[11]（卷10）}，才能取得好的效果。

从这些资料，不难看出张浚的事功思想确实是内容丰富，观点明确，态度鲜明，立场坚定，可行性很强。总之，他在如何建立事功的许多方面，都有所考虑，比较全面，值得重视和研究。

张浚倡导事功思想，不仅表现在著书立说方面，更表现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。他时刻不忘“清修笃慎”的目的，是在“孜孜为国”“有志天下”。他知道个人的力量有限，更需要团结有志于事功的人才共同努力。例如，他在任川陕等路宣抚处置使时，以刘子羽为上宾，任赵开为都转运使，擢吴玠为大将守凤翔，选用王彦、关师古、吴玠、杨政、田晟、王宗尹、王喜等人，“后皆有声，世服其能知人”。又如张浚“自淮西归，与赵鼎同在相位，以招徕贤才为急务，从列要津，多一时之望，人号为小元祐”^{[2]（卷44）}。再如，孝宗即位后，他上奏说“今日便当如创业之初，每事以艺祖为法，自一身一家始，以率天下”。他“力陈和议之非”，劝孝宗“坚意以图事功”，“且谓新政以人才为急，人才以刚正为先，因疏当今小大之臣，有经挫折而不挠，论事切直者，凡十数人荐于上”^{[9]（卷3）}。隆兴元年（1163年）复为枢密使，都督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，渡淮北伐，收复宿州等地，后因部下将领不和，兵败符离。人们常说“不以胜败论英雄”，虽其功未就，但其志可嘉。

张栻的事功思想，是在继承张浚抗金报国志愿基础上，“慨然以奋伐仇敌，克复神州为己任”的实践中日益发展，形成了更加细致、较为完整的体系。张栻在《南轩集》《南轩易说》《孟子说》等书中，“事功”一词出现13次，下面引用其原文，略加疏解。张栻认为，治国必须讲求“事功”。因此，在其《廖公（刚）墓志铭》中，对廖刚所奏“事功不立，命令不孚，及兵骄官冗之弊”，请求进行改革，表示支持^{[6]（P38）}。

他还认为，“事功固有所当为，若曰喜事功，则喜字上煞有病”。事功，固然是应该讲求的，但不能只是“喜欢”就可以了。以管仲为例，不能“但称其救世之功”，还应该“问其仁。而独称其事功，则其于仁也，亦可知矣。然使其果为背君而从仇也，则虽事功亦不足称矣”。事功是有标准的，应该看其是否符合“仁”，是否违背“君”，如果不符合，就不足称道。“夫子但称其救世之功，问其仁而独称其事功，则其于仁也亦可知矣。然使其果为背君而从仇也，则虽事功亦不足称矣。”^{[5]（19）}同样的原因，“管晏朝夕之所以处己处人者，莫非图功而计利耳，故得君之专，行政之久，而其事业有限（盖不出于功利之中）君子不贵也”^{[5]（卷2）}。

他还说：“大抵易则易知，简则易从，故能悦诸心；知险知阻，故能研诸虑。心之悦也不忤于理，虑之研也不昧于事；则得者为吉，失者为凶，吉凶既定，则凡勉于事功者，莫不弘之不息，以成其功。”^{[12]（卷2）}讲求“事功”，必须经过仔细考虑“不忤于理”，制定计划“不昧于事”，方能成功。

“事功”的可行不可行，成功不成功，关键在于什么人?在于什么时候?张栻说：“当其可而已，此之谓时中。禹稷立乎唐虞平治之朝，当天下之任，故以生民之未得其所为己忧，其溺也犹己溺之，其饥也犹己饥之。在禹稷之时，居禹稷之任，固当然也。颜子生于乱世，鲁国之匹夫耳，任行道之责者，有孔子在，则颜子退居于陋巷可也，在颜子之时，处颜子之地，固当然耳。譬诸同室之斗，则当被髮纓冠而救之，乡人之斗则闭户可也。此禹稷、颜子之事所以为不同。然其为当其可则一而已。故曰：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。禹稷之事功，果何所自乎?德者本也，事功者末也，而本末一致也。故程子曰：‘有颜子之德，则有禹稷之事功，所谓事功在圣贤夫何有哉?惟其时而已矣。’”^[12] (卷4)大禹和后稷的时代，为了治水和救饥，他们领导民众齐心干，取得了事业的成功。颜回生于乱世，只是鲁国的一个匹夫，不能有所作为，他退居于陋巷，是可以理解的。《南轩集》中有一篇《风雩亭词》曰：“独点也之操志，与二三子兮不同。方舍瑟而铿然，谅其乐之素充。味所陈之纡余，夫何有于事功。盖不忘而不助，示何始而何终。于鸢飞而鱼跃，实天理之中庸。觉唐虞之遗烈，俨洋洋乎目中。惟夫子之所与，岂虚言之是崇。”^[5] (卷1)张浚、张栻父子的事业、事功思想，不仅非常突出，而且很有原则，是理学与时俱进、发现弊病后，适应时代转型的新思潮。

三 结语

从以上张浚、张栻父子的生平和思想特点的论述中，不难看出他们这个学派，在两宋之际由蜀而湘，适应时局的变化，与时俱进，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，走出书斋，走向战场，积极服务社会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，不仅作出了重要的贡献，而且具有与其他诸多学派不同的特点。最早旗帜鲜明地倡导事功思想，堪称事功学派的先驱。至于其学派的地位和影响如何?当另文论之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脱脱. 宋史 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77.
- [2] 黄宗羲, 全祖望. 宋元学案 [M]. 上海:世界书局, 1936.
- [3] 王梓材, 冯云濠. 宋元学案补遗 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2011.
- [4] 李心传.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[M]. 四库全书影印本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0.
- [5] 张栻. 孟子说 [M]. 四库全书影印本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0.
- [6] 张栻. 南轩集 [M]. 四库全书影印本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0.
- [7] 朱熹. 宋名臣言行录·外集 [M]. 四库全书影印本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0.
- [8] 朱熹. 晦庵集 [M]. 四库全书影印本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0.
- [9] 李幼武. 宋名臣言行录·别集下 [M]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0.
- [10] 张栻. 论语解 [M]. 四库全书影印本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0.
- [11] 张浚. 紫岩易传 [M]. 四库全书影印本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0.
- [12] 张栻. 南轩易说 [M]. 四库全书影印本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0.

[13] 徐乾学. 资治通鉴后编 [M]. 四库全书影印本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0.